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若干人生观理论体系评析

郑历兰 郑庆生

(1.中共徐州市委党校 江苏 徐州 221000 2.江苏省九州大学 江苏 徐州 221000)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1978年以来出现的若干影响较大、问题突出的人生观理论体系的评析,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研究的四种误区:一是局限于世界与社会共同本质和规律的研究;二是局限于人的本质的静态研究;三是局限于人的本质的历史性发展研究;四是局限于“人生问题”的研究。并在分析上述局限性的基础上指出:人生观的研究必须把人的本质和规律作为主题,深入探寻人的社会本质的内在矛盾及其表现形态、发展规律和一般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日益认识人生真相,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真理体系。

【关键词】人生观 理论体系 评析

中图分类号 B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1-0010-03

1978年讨论真理标准、端正思想路线以来,我国理论界关于人生观的研究,选题广泛,收获颇丰,已有几十本教材或专著问世,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综观这三十年产生的人生观理论体系,我们也发现了突出的问题,严重的分歧。为了进一步暴露矛盾,活跃思想,端正方向,深化研究,给全国普遍开展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提供理论支撑,本文试对若干影响较大、问题突出的理论体系做一些简要评析。

一、局限于世界与社会共同本质和规律的研究

即用世界观和历史观研究取代人生观研究。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就是这样。该书“不从人生而谈人生……就讲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和辩证唯物的历史观”^{[1](p2)}。作者认为:“人生观就是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世界如何认识,而又根据这种认识所产生的对生活道路的选择以及思想、情操、道德品质等一系列的精神气质。”^{[1](前言)}“有了正确的世界观,认识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认识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认识了实践和自觉能动性的意义,那么应该怎样处理人生,大概都可‘迎刃而解’了”^{[1](p119)}。黄国秋的《人生哲学新论》也属于这种体系。作者说:“所谓人生哲学,就是用一定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解释人生问题的理论体系。”^{[2](p110)}该书也是首先阐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然后再用它分析人生的若干重大问题,形成种种结论。

这种人生观理论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生真相,但并没有完全反映人生真相,还是不彻底的人生观。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生真相,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是关于世界和社会共同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包含着人的本质的根本方面。做人同做事一样,也必须

以它为根本性指导。说它没有完全反映人生真相,是不彻底的人生观,是因为人具有多层次的本质和规律,而辩证唯物主义只是揭示万物的共同本质和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揭示社会的共同本质和规律,它们并没有揭示人的特殊本质和规律。毛泽东说:“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3](p309)}仅仅用这种共性认识指导做人,设计人生,等于让一个只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理论而不懂驾驶技术的人开汽车,运宝物,必然陷入歧途,遭遇失败。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不仅研究了世界和社会的共同本质和规律,还研究了人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18)}后来,他们还进一步揭示了人的本质的构成要素及异化现象。这些哲学论断为研究人的本质和规律,开辟了崭新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应当看到,上述关于人生观理论体系的片面认识会导致自我否定,根本放弃人生观研究。既然人生观就是世界观,使用人生观概念、研究人生观课题岂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事实上,在1978年以前的很长时间内,确实存在着只谈世界观,不谈人生观,甚至禁谈共产主义人生观这种现象。这固然主要是“左”的政治思潮所致,但也与探索人生观却又不探索人的本质和规律有关系。

二、局限于人的本质的静态研究

即仅仅停留在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构成要素

* 作者简介 郑历兰,女,江苏省徐州市委党校哲学学科教研室主任,讲师,硕士 郑庆生(1942-),男,江苏省九州大学两课教研室主任、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的简要分析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的理解上,而不去深入研究人的本质内部的根本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在个人那里形成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一般过程,没有研究人生发展的基本规律,没有把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毛泽东说,矛盾分析法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3]p307}。他们却没有这样做。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大学人生哲学教材,多数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吴汉德编著的《人生哲学》,虽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人生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人生的本质及其规律”^{[5]p14},但是在分析人的本质时,却仅仅指出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人的本质是现实的、具体的,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社会属性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并没有具体揭示人的各种社会属性的辩证关系及其演变规律和过程。该书的主要内容并不是分析人生真相,而是回答人的价值、理想、责任、义利、幸福、荣辱、爱情、命运、生死等方面的问题。

应当肯定,这种人生观理论体系有所创新。在文革及其之前,由于我国急于赶超西方国家,急于“穷过渡”,偏重社会的发展,忽视个人的发展,宣传舆论上存在忌谈“个人”的倾向,理论研究上也很少涉及人生问题。冯定当时就说过:“谈人生问题,很不容易,谈得不好,往往落入‘个人’的罗网或圈套。”^{[1]小序}1978年之后,在真理标准讨论的推动下,国内出现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热烈讨论,人生观研究方才进入探讨人的本质阶段,历代研究人生真相的传统又恢复了。上述体系是对“不从人生而谈人生”错误倾向的积极否定。

但是,这种创新仍然不够。事实上,人的哲学问题不仅包括“人是什么”,而且包括“人的发展规律和过程是什么”。规律展现本质的存在,造就它的发展。毛泽东说:“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3]p308-309}只有既反映事物的本质,又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才是“完整地反映整个的事物”^{[3]p291}。仅仅研究“人是什么”,只是把人的哲学研究进行了一小半,仍然没有完整地把握人生真相,还不是彻底的人生观。

局限于人的本质的静态研究,也无法提出完整的做人方法。科学的方法都是以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完整认识为依据的,都是对某种科学法则的具体运用。法则是源,方法是流。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完整地研究和揭示某种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为根本任务。辩证法要求人们“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3]p304}。不去把握人的本质的发展规律,怎么可能提出科学的做人方法呢?

三、局限于人的本质的历史性发展研究

即只重视人的本质随着社会形态发展而发展的研究,却忽视人的自我发展的研究。例如,韩庆祥等人认为:“人学研究对象就是人的问题,是完整的个人及其存在、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6]p126}人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一是个人的完整性,这是个人的完整图景;二是完整个人的本质(包括人性),这是人的本体;三是个人的存在,这是个人在空间中的存在处境;四是个人的历史发展规律,这是个人在时间中的发展。”^{[6]p14}书中明确指出:“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实质就是寻求和揭示人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为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平等全面发展提供有效的方式和途径。”^{[6]p237}从

内容安排看,作者用很大篇幅深入研究了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三大历史阶段的区别,以及人的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规律、条件与方式,却没有关于人生自我发展规律和过程的阐述。

忽视人的自我发展规律和过程的研究,仍然难以克服人生观理论的不彻底性。正如地球不仅随着太阳公转而且也自转一样,人的社会本质既伴随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发展而发展,又伴随自我选择而发展,同时代的人正是因为后者而具有不同的社会本质,发挥不同的作用,形成不同的价值。忽视人的自我发展规律和过程的研究,仍然不能完全把握人生真相。

从做人的角度说,忽视人的自我发展规律和过程的研究,是致命的缺陷。人的发展,既取决于自我,又取决于社会和自然界,不仅存在自我矛盾运动的规律,而且存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矛盾运动的规律。自我矛盾(内因)是根据,人与社会和自然界的矛盾(外因)是条件。只有找到人生发展的内部根据,才能把自我选择建立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探索人生观是为了给做人提供理论依据。它如果没有找到人发展的内因,不能为自我选择提供科学依据,那么就毫无意义。

从这种不彻底人生观引出的方法论也仍然缺乏“个人视角”。人是社会的细胞,又是自觉能动的社会主体。因此,做人既是社会的需要,又是自我的需要。谈做人,既要有社会视角,又要有自我视角。上述人生观理论体系忽视人发展的自我因素,也就无法从个人角度谈做人,就不能使人感到是对自己的终极关怀。

四、局限于“人生问题”的研究

局限于“人生问题”的研究,即只是讨论人生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不去研究人的真相。其代表作是《人生观通论》。该书认为:“人生观是人们对于人生问题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它以人生为对象,是人们对生活的目的、意义、价值的理解和看法。”^{[7]p3}“人生问题,归根到底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这个关系的核心,也是人生观理论研究的核心。”^{[7]p4}这就是说,人生观不是关于人生真相的观点,而是关于做人重大问题的观点。它研究的核心是个人应当同社会保持什么样的关系。该书甚至说:“人生观的研究对象是人生实践,是人应当怎样生活、怎样生活才有价值的问题……人的本质问题不能成为人生观理论基本问题”^{[7]p57}。

把人生观研究局限于人生问题上,是舍本求末,缘木求鱼,必然劳而无功。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本质,就是事物根本矛盾规定的原始的、内在的、根本的属性,它使该事物与它事物区别开来,它规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内容和结局。而本质的发展规律,决定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不可抗拒性。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肯定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根本规定性。人们变革某个事物,总是期望它充分发展它所属那种事物的共同本质;人们要想把握事物发展的总趋势,使事物的发展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必须认识事物本质的发展规律。同样道理,人的本质决定人生的基本内容和结局,人的本质的发展规律决定人生发展的总趋势。做人也只能期望遵循规律,把人的本质更好地培养出来。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说:“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人

类的本质。要正确掌握人究竟有什么样的特质,有什么样的本质,根据这个去考虑一切决策,这是最重要的。”^[8]只有科学地把握人的本质和规律,才能科学地回答做人的具体问题,形成科学的人生方法。否则,那种方法就缺乏依据,难以实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的许多人生观理论体系相去甚远,逻辑混乱,没有说服力,缺乏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仅仅停留在人生问题的讨论和做人方法的设计上。

从研究范式的角度看,把人生观的研究局限于“人生问题”也不正确。在中国,世界观与人生观两个概念是近代西方文化东进的产物,是在同一思维范式下形成的。按照这种范式,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首先是“观世界”,即研究世界真相,反映世界万物的本质和规律,例如揭示世界的物质性、时间性、空间性、规律性、可知性等,都属于对世界万物真相的认识,然后才是根据这种认识引出方法论;人生观首先是“观人生”,研究人生真相,反映人的本质和规律,然后引出人生方法论。如果人生观研究仅以人生问题、人生方法为主题,那就意味着人生观首先不是“观人生”,与上述思维范式相左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对于人生观的研究,不能用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研究所代替,也不能局限于人的本质的

构成要素或历史性发展的研究,更不能停留在人生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而必须把人的本质和规律作为研究的主题,深入探寻人的社会本质的内在矛盾及其表现形态、发展规律和一般过程,即深入探寻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规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在人的本质发展中的具体展现形式。^[9]只有这样,才能日益认识人生真相,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真理体系。

参考文献:

- [1] 冯定著.人生漫谈[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 [2] 黄国秋.人生哲学新论[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 [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1.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
- [5] 吴汉德.人生哲学[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 [6] 韩庆祥,邹诗鹏.人学——人的问题的当代阐释[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 [7] 张孝宜.人生观通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 [8] 松下幸之助.创业的人生观[M].军事译文出版社.
- [9] 郑庆生等.穿越人生的迷雾——人生哲理对话[M].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

(上接第9页)义。“北方谈话”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深入和全国性的思想大解放,加速了历史转折的实现。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共辽宁省委和沈阳军区随即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形成了解放思想的热潮,并很快扩展到全国其它地方。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和其它有关问题,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好的。接着,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主要领导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纷纷表态,肯定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很显然,这场讨论已经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围,而演变成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表态,从而大大减弱了“两个凡是派”的力量,扩大了“实事求是派”影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历史转折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思想基础。

邓小平“北方谈话”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北方谈话”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的历史高度,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雏形,为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邓小平自己反思粉碎“四人帮”后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段历史时,深有感触地说:“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路线是不可能的。”可以说,邓小平“北方谈话”正是他这两年的理论思考的集中论述和表达。“北方谈话”所具有的创新性和影响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开始发生质的飞跃。

“北方谈话”与后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

向前看》和“南方谈话”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密切的逻辑关系,可以说“北方谈话”是这两次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的历史渊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所论述的主要问题在“北方谈话”中大部分都做了深刻阐发,“北方谈话”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理论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又是“北方谈话”的规范表述和进一步丰富发展。“北方谈话”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开始明确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新的开端和初步思考,而1992年的“南方谈话”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理论总结和经典概括。可以说,“北方谈话”是“南方谈话”的发端和雏形,“南方谈话”是“北方谈话”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与升华。因此,在邓小平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的“北方谈话”在不少方面都作出了初步回答,这次“北方谈话”虽然不可能涉及邓小平理论的所有方面,但确实涵盖了邓小平理论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的“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坚实基础,也拉开了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的序幕。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M].北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